

黑格尔辩证法讲演录

邓晓芒摇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序 摇 言

这本书是我 1994 年夏季学期为武汉大学本科生开设《黑格尔辩证法研究》的选修课的课堂录音记录,整理录音的有博士生徐良梅、夏宇、苏德超和硕士生陈进,最后由我自己审定和修改。由于前面两讲录音不全,所缺部分由我自己事后补上,所以有不少句子是书面语,虽然我尽量使它们不要太书面化,但效果不明显。不过,总体上看,本书要比我的专著《思辨的张力》通俗易懂多了。这也是这本书之所以还可以出的价值所在。《思辨的张力》出来已有十多年了,其影响至今还是停留在专门的学术圈内,无法扩展到广大青年学生中。但唯一例外就是我在课堂上的讲授。自从 1985 年以来,我为本科生开设《黑格尔辩证法》课有四次,即 1985 年、1986 年、1987 年、1988 年,没有哪次不要换教室,即最先安排的教室坐不下,只好申请换到更大的教室。最后这次来听课的有两百多人,而且从头至尾济济一堂,热烈非凡。我很难想像在一个黑格尔被当作过时的哲学家而几乎无人问津的时代,学生们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兴趣来听这种颇费脑筋、近乎做“苦工”的课程。这次讲课从 10 月 1 日开始,由于我 10 月 15 日要去台湾讲学两个月,于是把课程压缩在不到两个月内,每周讲两次,每次 1 节课。有学生自发地录了音,我当时并没太在意。后来我的研究生说他们要整理录音,我还是没有放在心上。直到 1994 年夏天,我收到

北京大学出版社杨书澜先生的约稿函,才想起确实可以弄成一本哲学通俗读物或本科生教材,这才与研究生们商量具体整理的事宜。几个研究生积极性很高,不久就完成了全部录音的整理工作,这是要在这里特别提出感谢的。接下来,我又经过边录入电脑边修改,终于完成了这部书稿。再次阅读一遍,感到它的优点和特色就在于原汁原味地记录和保持了我在讲课时的那种课堂气氛(特别是后面三讲),这是专门用心撰写的学术著作所无法达到的效果。

黑格尔哲学、特别是黑格尔辩证法是我长期以来关注和研究的一个学术专题。但正如研究康德没有止境一样,研究黑格尔哲学同样是一个无底洞。在这次整理课堂录音的过程中,我发现又有不少地方是以前没有注意到,而现在还可以扩展开来谈得更深入些的,还有些地方找到了比以前更好、更准确的表述方式。当然这些都是一些临时发挥的灵感式的东西,还有待于将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时参考和审定。无论如何,我觉得这种教学和科研相互促进的方式的确能够给自己的学术生涯带来极大的收获。所以多年来我除了研究生的课程以外,一直都坚持每年给本科生上一到两门课。面对学生,我自己觉得思路特别开阔,也获得了学生的好评。我觉得这是我使我的思想与当前时代保持密切接触的最佳方式。本来我自己做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把它做成我们当代中国人的学术研究,不是钻故纸堆,而是要推动一种时代精神,要鼓动一种青春思想,要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思潮。在当前中国学术界极度浮夸、浮躁的现实环境下,能否倡导一种认真踏实、深沉反思的学风,能否激发青年学子通过自己的严肃思考来建构自己的新型的世界观,以适应我们这个与传统完全不同的改革中的社会,这是我所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德国古典哲学就有这样一种作用,它不仅仅在 18 世纪的那个年代,而且直到今天,都还是西方思想界举足轻重的重头戏,在大学课堂里是每学期都要上演的。反观国内,如今能够系统开设德国古典哲学的专题课程的大学已经不多了,近二十年来人们认为古典的学问不能解决当代问题的急需,于是纷纷转而追赶西方最新的时髦。然而我却多年

来一直把德国古典哲学看做中国在一个长时期内所摆脱不了的启蒙课题,并抱着这样的期望在这个冷清的领域里做着自己的思想实验。事实证明,我的理解是有根据的。当我在课堂上面对学生那一双双充满渴望的眼睛和生动的表情时,我常常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就是觉得一百多年前那些摧枯拉朽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在发挥它的威力,它使中国当代大学生那早熟而世故的心灵焕发了青春,使那些到处弥漫的颓废情绪开始消散,使萎靡不振的精神获得了新的勇气和力量。哲学无东西,无国界,我的这一信念在课堂上再一次得到了验证。尽管我讲的是外国的东西,而且是外国古典的东西,但却与我们当代的现实如此合拍,与大学生们的思想状况如此共鸣,这的确令人振奋,也令人惊奇。人们通常把黑格尔称之为“老黑格尔”,我却因为讲授黑格尔而感觉自己迸发出年轻的激情和锋芒,能够和青年人同呼吸、共命运。

本书的读者也许会发现,我的黑格尔研究严格说来并不纯粹是黑格尔研究,而是借黑格尔哲学来做中国思想的研究。我在课堂上做了大量的中西哲学的比较,一方面是为了我们中国的大学生更好地把握黑格尔思想的真实内涵,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激发起青年人对自己所受到的传统文化影响抱一种自觉批判的态度。很难说这两方面哪一方面更重要,它们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前不久一位博士后惊讶地对我说:“我发现邓老师其实是研究中国哲学的!”我听了以后很高兴。这正是我的初衷。我所有的哲学研究,康德也好,黑格尔也好,马克思也好,胡塞尔也好,都是中国哲学。人们也许还会发现,我所做的也不止是西方古典哲学,而且是中国当代哲学。我从德国古典哲学家们那里所吸收的哲学思想,都是与当代中国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所以我在课堂上,时常举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来说明一个思想,有时没有举例子,只是一个用语,一个当前的流行语,就能使学生会心一笑。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哲学思想本身的魅力,西方哲人们所思考的问题,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很多都从来没有涉及过,在以往的介绍中也往往被忽略了,而在我们的时代,正是应当涉及这些问题的时候。所以我讲的内容对学生们总是有一种新鲜感,能够让他们有一种思想视野的扩

展和思维层次的深化。当然,这是对那些爱学习并且爱好哲学的学生而言。现在,青年人“爱好哲学”被视为一种罕见的事情,这是很不正常的。哲学就应该是青年人的兴趣,青年人怎么会不喜欢哲学呢?除非是那种伪哲学,那种不是激发人的思想、而是限制人的思想的“哲学”。真正的哲学,每个青年人都天然地会感兴趣。我希望通过我在课堂上和书本中的努力,改变一点目前国人对哲学的偏见,使哲学成为当代中国年轻一代所热烈关注的一门“显学”。

邓晓芒

四二零年元月于珞珈山

目 录

序言	(员)
绪论 摇黑格尔哲学与中国传统思维	(员)
第一讲 摇黑格尔辩证法的两大起源	(远)
一、西方理性概念的内涵及文化背景	(苑)
二、逻各斯精神的发生	(苑)
三、努斯精神的形成	(圆)
第二讲 摇黑格尔哲学的开端	(猿)
一、为什么要有开端?	(猿)
二、逻辑学怎样开端?	(猿)
三、第一个三段式:有、无、变	(源)
四、《精神现象学》的“开端之开端”	(缘)
第三讲 摇黑格尔辩证法的灵魂——否定	(缘)
一、否定的含义:从文化背景来看	(缘)
二、否定与否定之否定	(苑)
三、否定与目的性	(愿)
四、否定与主体性	(怨)
五、否定与自由	(员)
六、否定与理性的异化	(员)
七、否定作为矛盾	(员)
第四讲 摇黑格尔辩证法的形式——反思	(员)
一、反思的文化背景	(员)
二、反思的结构	(员)
三、反思与理性	(员)

摇摇圆知性	(圆圆)
摇摇圆消极的理性	(圆圆)
摇摇圆积极的理性 思辨	(圆圆)
四、反思的逻辑功能	(圆圆)
摇摇圆颠倒	(圆圆)
摇摇圆必然性	(圆圆)
摇摇圆综合	(圆圆)
第五讲黑格尔辩证法的逻辑学、认识论、 本体论的统一	(圆圆)
一、辩证逻辑与认识论的统一	(圆圆)
摇摇圆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关系	(圆圆)
摇摇圆辩证逻辑与体验	(圆圆)
摇摇圆辩证逻辑与认识论的统一	(圆圆)
二、辩证认识论与本体论的统一	(圆圆)
摇摇圆辩证理性	(圆圆)
摇摇圆理性与实践	(圆圆)
摇摇圆辩证认识论与本体论的统一	(圆圆)
三、辩证本体论和逻辑学的统一	(圆圆)
摇摇圆自由和必然	(圆圆)
摇摇圆现实的与合理的	(圆圆)
摇摇圆历史的与逻辑的	(圆圆)
参考书目	(圆圆)

绪论

黑格尔哲学与中国传统思维

今天我们开始讲黑格尔哲学。我所用的教材,是我出版于 1984 年的一本书《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年重印)。但我不完全照书上的讲,有些发挥和修改,也有些忽略不谈。

黑格尔哲学在今天很不景气,人们基本上是把黑格尔当作已经过时的“死狗”。但是,奇怪的是,不断地有当今最时髦、最先锋的哲学家重提黑格尔,如海德格尔,如德里达。唯独中国学术界,许多人每当读到这些先锋哲学家谈论黑格尔的地方,就匆匆翻过去。中国人做学问精得很,老是找那些能够引起轰动效应、能够“出彩”的话题。特别是年轻人,做学问“扎堆”的现象十分严重。一做海德格尔,大家都做海德格尔,一做德里达,大家都做德里达,“咸与维新”。到了近两年,大家谈海德格尔好像已经谈腻了,当人们忽然觉得黑格尔还可以拣起来再谈一谈的时候,已经没有几个人能谈了。即使谈,人们也很少超得过去在黑格尔热的时候那么多人已经谈到过的水平。

其实,在 19 世纪初传入中国的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西方学术思想中,黑格尔哲学是颇受当时中国学人青睐的一种。人们觉得黑格尔是西方一位思想深邃的“大儒”,他追求的是宇宙的“太极”和最高的“玄学”道理,所

以他是当今西方人迷恋于奇技淫巧、物质享乐的日益堕落的风气中的一位“圣人”。胡适曾经将杜威的实用主义与中国传统考据之学即所谓“小学”挂起钩来,而黑格尔的那些在中国的崇拜者和解释者,他们阐释黑格尔哲学用的是中国传统本根论的形而上学,就是所谓“大学”。这种形而上学发端于周易,张扬于老子,完成于宋明理学。因此,中国人最初是用程朱陆王的心性之学的眼光去接受黑格尔哲学的。根据当代解释学的文化传播和接受原理,这也是只能如此、必须如此的,否则是无法接受的。平心而论,我们中国人接受黑格尔哲学的起点还是比较高的,至少比日本人要高。

黑格尔哲学的传播热潮不久就被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所盖过了。但是奇怪的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黑格尔哲学,是与青年黑格尔派密不可分的,它们的关系呈现为一个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必然发展过程,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家同时也是研究黑格尔的专家,但是在中国,研究黑格尔哲学的和引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却不是同一拨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与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似乎毫无关系。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开始看中的主要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而且是在不了解或不很了解马克思哲学的来源的情况下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只是在后来,人们才开始对马克思思想的来源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有了一点兴趣。因此在中国,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来研究黑格尔哲学便存在双重的难处。一是马克思主义者与黑格尔的研究者和崇拜者之间有某种难以处理的关系,他们原来是各不相干甚至相互竞争的思想流派。要研究黑格尔哲学,贺麟先生这些人是权威,但这些人又是“唯心主义者”;不研究吧,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又说不过去,所以还得尊重贺先生这些专家。20世纪下半叶贺先生及其弟子们因此就经常性地处于一种忽明忽暗、不上不下的境地。二是,原版的黑格尔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中国阐释之间也很难达到一致。用理学来解释黑格尔哲学固然方便,易于被人接受,但同时也带来了曲解和遮蔽的毛病。宋明理学只是一个入门,如果论者停留于此而不求上进,不求甚解,便成了迂腐之见。迄今为止,撇开那些将黑格尔哲学庸俗化的倾向不谈,即使最有理论深度的研究,都还在很大程度上未脱出宋明理学的樊篱。如对“一分为

二”、“合二而一”、“矛盾”等等关键概念的解释就是这样。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文化差异问题。文化差异能不能自我超越？传统能不能超出自身？当代许多学者对此是持否定的态度的。我认为，从历史上看，整个世界史就是一个文化传统不断自我超越的过程，那些不能自我超越的民族和文化注定是要灭亡的，最终会由别的民族对之作考古学上的超越，就像我们今天对待埃及人、玛雅人的文明一样。但另一方面，超越历来也不能直接达到。例如文字差异就是一个难以跨越的障碍，即使都会说外语，文化传统的差异仍然存在。这种差异只能通过不断地翻译加解释，才有可能逐渐缩小，文化的融合和超越才有起码的条件。当然这是一个无限的过程，没有一个最后的终点。事实证明，今天的中国人比起一百年前毕竟已经“西化”多了，但我们并没有因此变成西方人，“中国特色”是没有那么容易丢掉的。尽管在过去一百年中，黑格尔哲学在中国一直是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外的一门“显学”，但我以为对它的研究本应做得更好、更有成效一些。我对黑格尔哲学的再考察，最初的动机就是立足于文化超越，就是试图排除我们固有的传统文化偏见，将一种原版的西方学术思想向国人作一种更忠实、更确切的介绍，以便发现和衬托出我们视野中的盲点，悟出某些闻所未闻的道理。当然我不敢说我所讲的就是百分之百的“原版”，而且是否有所谓的“原版”本身就值得质疑，但我的出发点确实就是如此，并且我可以保证，我讲的和你们从以往的教科书上所看到的将会大不相同。

其实，不光是教科书，就连当今社会上人们认为最新颖、最时髦的西方思潮，一般国内流行的解释都还离原版差得太远。而当今热门的中西哲学和文化的比较，也大都是在不了解或不太了解西方文化传统的学术大背景下，仅凭只言片语就下结论的泛泛之谈，更不用说深入西方思想的深处、乃至与西方学者展开持久的对话了。黑格尔哲学在很长时期内也曾是中国流传甚广的一种时髦思想，我不过是选择了这种一度最“普及”的西方时髦来作为一种有目的的解剖而已。通过对黑格尔这一典型例证的解剖，我发现了许多为中国学者长期所忽视和视而不见的东西；但我的目的除了揭示出这些内容以外，更重要的是想以此为例提供一种研究的

方法和态度,想说明我们中国人在进行任何西方思想的研究时,都应当首先注意其文化背景和文化差异。尤其是对于现代思潮如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萨特等等这些人文倾向很浓厚的学者,绝对不能简单搬用他们的观点和说法,而要先做很多复杂的文化比较工作。而以黑格尔哲学为主题有一个好处,就是每个学过哲学的中国人似乎都“懂一点”黑格尔。由于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渊源关系,至少人们对“辩证法”、“对立统一”、“矛盾的同一性”、“扬弃”等等这些名词不会感到太陌生。所以从这里入手,便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容易进入人们的视野。每个自以为懂一点哲学的人都可以作一番比较,看看自己以前所理解的哲学究竟如何,有没有什么误解,如果有,引起误解的原因何在。

在这篇绪论中,我想预先提出我的基本观点,以便大家能够有一个大致的总体概念。我的研究表明:中国人对黑格尔哲学,特别是其核心黑格尔辩证法的研究,长期以来忽视了两个最基本的要素:一个是体现为能动的自我否定的努斯精神,另一个是体现为反思方法的逻各斯精神。而这种忽视的根源,是由于中国传统哲学中恰好缺乏这两种基因,既缺乏主体能动性的动力,又缺乏逻辑反思的要求。这种文化基因上的缺陷就使得我们在理解黑格尔辩证法,以至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带来一种不自觉的遮蔽性,产生了一系列的误解。我们只能在一个相当表面、相当肤浅的层次,在这里那里随意选取一些适合自己固有思维框架的观点加以解释,这些解释不仅毫无内在关联和逻辑,而且由于它们往往基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本身就是误解。这样一来,辩证法这样一种原本是生动活泼、充满生机的思维方法,在中国竟变成了一条一条僵死刻板的教条,或成为了某些人戏弄群众、玩弄权术的诡辩术。当然,这不能怪原版的辩证法,而是中国数千年法、术、势的统治体制在现代的借尸还魂。一个真正的思想者,不能满足于将这种所谓的“辩证法”抛弃了事,而应当认真考察一下真正的辩证法究竟为何物,假辩证法为什么蒙蔽了那么多人,那么久而无人察觉。这种思考,实际上是我们对自己的反思,是民族的自我反思。

我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反思和再考察可以归结于:将黑格尔哲学中长期被人忽视了的否定原则和反思原则作为黑格尔辩证法最

根本的两大要素重新提出来加以强调,分析它们各自的内涵及双方的辩证关系,以此为主线来破除和清理我们长期以来深信不疑的种种误解。这一分析的意义决不限于黑格尔哲学研究,而是有可能展示整个西方文化最深刻的矛盾和精神结构,对自古希腊以来逐步形成的西方精神提供一个较为完整和清晰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又是极其简明的,它甚至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西方精神是由努斯精神和逻各斯精神所构成的一个张力系统,或者说,这两大精神的对立、冲突、互相转化、自身同一,便构成了西方文化史,包括西方哲学史。与此同时,这一分析也将揭示我们自己固有文化中的缺陷,即努斯的冲动和逻各斯的构成力量都感到不足,从而导致了我们的文化的停滞、僵化和老化,总是在一个文化—反文化—恢复文化的圈子中循环,没有文化的超越和飞跃。中国文化的生命冲动总是盲目的,不能上升到逻各斯的规范;中国文化的构成力量又总是压抑生命冲动的,它不是一种进取的力量,而是一种保守力量。

在今天,每一个想要对自己民族的文化取得一种文化自我意识的人,都必须研究西方文化,就像要照镜子一样;但要真正研究西方文化,只有从那些集西方文化之大成的大思想家那里入手才最有收获。黑格尔就是这样一位大思想家,他是古典西方哲学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尽管已经为后人所超越,但却融汇了全部西方精神的矛盾于一身。

我们这门课程,将特别注重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来探讨黑格尔哲学的精义,比较的目的有二:一是要更准确地理解黑格尔哲学的精髓,随时随地将原版的黑格尔与我们的误解区别开来,达到理论上的客观性、精密性、科学性;二是通过原版的黑格尔来更自觉地理解我们自己,并从一种外来的陌生思想中吸取我们超越自身的动力。

第一讲

黑格尔辩证法的两大起源

黑格尔辩证法不是一下子从天上掉下来的。他自己经常承认他的思想在西方两千多年的哲学史上的渊源关系,其中讲得最多的是从古希腊哲学中汲取营养这一渊源关系。我们要探讨黑格尔的辩证法,就必须厘清这一思想在历史上的来龙去脉;我们要把这一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进行比较,也必须首先深入到它的思想源头,从这个最初的原始形态的源头入手进行比较。这个源头就是古希腊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明显地是从古希腊发展而来的,“辩证法”这个词,即 διαλεκτική,就是个希腊词,它是由柏拉图提出来的。当然,黑格尔的辩证法除了哲学上的思想渊源外,还有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它与古希腊人的生活方式,与他们的政治体制、物质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文化生活如诗歌、戏剧、文学艺术等等是分不开的。黑格尔从少年时代起就熟悉并崇拜古希腊的精神氛围,认为那就是西方文化的精神家园。希腊城邦民主制在黑格尔心目中简直就是古代世界的理想。然而,这个理想的时代却是由两种不同的精神要素在相互冲突中所形成的张力构成起来的。也就是说,在古代希腊的文化背景中,一开始就蕴涵着一个内在的矛盾,这就是努斯精神和逻各斯精神的统一。这两种精神的产生,是与古希腊社会特殊的文化结构密切相关的,它们共同形成了西

方“理性”概念的内涵。而黑格尔辩证法则是西方理性精神的集大成的体现。我们先来对理性的这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西方理性概念的内涵及文化背景

首先我们来看努斯精神的来源。努斯,希腊文为 $\nu\sigma\varsigma$ 意思是“灵魂”或“心灵”,它代表人的一种不受肉体束缚的超越性和自发性,人的行动的自决和自动性。灵魂的特点是单一性、个别性,不依赖于其他东西的独立性,在个人心中它是至高无上的主宰,是肉体 and 行动的支配者,肉体是被动的,灵魂却是主动的。柏拉图把努斯定义为“自动者”,他认为世界上的事物有三类,一类是自己不动而为他物所推动的,这是自然物体;一类是自己运动而又能推动他物的,这是人的灵魂即努斯;还有一类则是自己不动而能推动万物的,这就是神。人的灵魂就其能够推动他物、成为他物的主宰而言是与神相通的。亚里士多德则从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人的灵魂有三个层次,最低的层次是植物性灵魂,代表人的生长营养等生命活动,较高的是动物性灵魂,代表人的感觉记忆等心理活动,最高的则是理性灵魂,代表人的思维和认识活动。三者中,唯有理性灵魂,即“努斯”,才是超越性的,它不随着人的肉体的死亡而消失,而是直接与神相通。因此努斯与人的肉体存在及与此相关的世俗生活不同,它不受任何外来的束缚,而是一种个体性的自由主体,是人的真正实体,其他一切如人的肉体、人的财产、人的幸福等等都是为它服务的。显然,个体灵魂的这种自由自决,这种不受物的支配而支配事物的地位,是与古希腊社会城邦民主制下个体意识的独立和对私有财产权的确认分不开的。有私产则有私心,连财产都得不到保障,如何能有个体意识的独立?而中国古代为什么缺少这种努斯基因,也正与私有产权没有得到确立以及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体制有密切的关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中国古代,土地历来只有使用权、占有权,而没有所有权。皇帝和政府可以“分给”农民土地,土地也可以转让、抵押和买卖,但都是对占有权而言的,所有权则从来没有得到过法律上的保障,所以也随时可以

由政府以“均天下”的道德名义没收或收回。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东方社会的秘密就在于私有制没有确立。所以,建立在古代私有制之上的个体意识的产生,是导致希腊努斯精神形成的社会历史根源,而反过来,没有确立私有财产及其个体意识则是中国文化缺乏努斯精神的深层原因。

再看逻各斯精神的起源。逻各斯,希腊文为 ~~λογος~~ 意思是“话语”、“表述”、“言说”,它代表人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意思时的规范性,因而又引申为“规律”、“命运”的意思。现代语言学证明,不可能有“私人语言”,语言都是公共的,在一个确定的社会群体中有它一定的普遍规范即语法。如果你不按照这种规范说话,就没有人能懂你的意思,你的话就白说了。希腊人特别重视语言,意味着希腊人重视人与人相互交往的普遍形式和规范性。为什么会这样?同样要追溯到古希腊城邦生活的基本模式。希腊社会是一个以工商业为本的社会,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成为社会生存的命脉,在这种普遍交往的社会生活中,公平交易和信用是不可少的。但信用靠什么保证?小范围内可以靠家族关系和熟人关系来维系,而市场经济形成的却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交往的范围扩展到欧亚非三大洲。在陌生人之间只能靠契约、文书和成文法律来交往,这些法律对事不对人,必须仔细、详尽,而且逻辑上一贯地规定在人际关系中每个人的义务和权利。有时这些规定是很麻烦的,没有清晰的逻辑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是不能胜任的。所以希腊城邦经常请一些著名哲学家和“智者”来给他们制定法律。没有这些法律,没有在这些法律之下所签订的契约文书,没有个人对这些契约文书上的签字所负的法律责任的认可,希腊人的日常生活是无法想像的。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这其实是自从古希腊以来西方社会就存在的一个客观事实。语言是什么?语言就是人的存在,因为在古希腊的那个陌生人社会中,人们就是根据一个人的语言、包括书面语言来判定一个人的人格,一个有产者也是靠他的言行一致和为他说过的话负责而取得信用,才能维系正常的人际往来的。虽然由语言来判定一个人,这不很可靠,但总比凭人内心捉摸不透的情感或凭他自称的家族名誉来判定他更为实在,因为这是一个有法可依的社会,法律为语言上的虚假陈述和欺诈规定

了明确清晰的惩罚条例。在这种经济活动原则确立的基础上,希腊社会建立起来的最能代表他们生活方式的政治形式就是雅典式的城邦民主制,它的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都是通过契约立法和投票来设计的。所以古希腊社会是西方契约社会的源头,在许多哲学家如智者派和伊壁鸠鲁派那里都提出过社会契约的思想。而任何契约都是通过语言、包括书面语言即文字所达成的。语言是一个人表现于外、表现在与别人的关系中的有自身客观规律的东西,在一个契约社会中它具有规范效力、法律效力,这种效力并不因人而异,而是具有逻辑上一视同仁的普遍性。所以希腊人对语言的重视主要是对语言的普遍性和规范性的重视,体现为对语法和逻辑的重视。这种逻各斯精神后来就发展为逻辑精神,从“逻各斯”(λογος)一词中也发展出了“逻辑”(λογική)一词。

古希腊的努斯精神和逻各斯精神是两种不同的精神,但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并且是出自同一个社会文化背景。努斯精神体现了希腊人对个体自由意识的初步的觉醒,这种自由基于每个人不受世俗感性事物束缚的超越性的灵魂,体现了自己决定自己、自己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的独立性;逻各斯精神则体现了这些个体灵魂在自由行动中所必须遵循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使他们能够继续作为自由主体存在,保持人格一贯性,而不至于在与别的自由主体的相互冲突中遭到毁灭。因此每个自由主体都有一种内在的普遍原则,他们按照自己的这种原则行动,以便保持自己行动的一贯,同时又保持与其他个体的行动的相互和谐。我们今天说“法律是自由的保障”,这个道理其实希腊人早在两千年前就懂得了。他们还知道,法律之所以是自由的保障,正是由于法律是由每个公民自由制定的,至少是自由认可的,这也是当时希腊城邦民主制的一个事实。所以努斯精神和逻各斯精神其实就是古希腊城邦民主制的精神。它们后来就发展出我们所谓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即“德先生”和“赛先生”。

从哲学上看,努斯精神代表一种个体自由的能动性和超越性,要超出一切外来的束缚和限制;逻各斯精神则代表一种普遍的确定性和规范性,要使一切无定形的东西得到形式上一贯的定形。这两种精神在取向上完全相反,即:逻各斯是规范,是命运,是人所